



共和国经济风云

赵士刚

主编

○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道君
版式设计 蒋 方
责任校对 郭红生 贾全惠

共和国经济风云

(上、下)

主编 赵士刚

出版: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 100035)

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33.5 印张 867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ISBN 7-80118-300-2/F · 291

定价: 5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 100836)

目 录

第一部 巨人奋起 ——经济恢复时期

一、曙光初照——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	(3)
1. 勾画蓝图：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制定	(3)
2. 新中国的家底：接收城市和没收官僚资本	(17)
3. 暴风骤雨：土改使农村获得新生	(33)
二、勒住脱缰野马——制止通货膨胀创下奇迹	(50)
1. 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共产党在经济上打零分吗?	(50)
2. 没有硝烟的战斗：与投机资本的较量	(63)
3. 实现财政平衡，通货膨胀随风而去	(87)
三、星光灿烂——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102)
1. 机器轰鸣是最美的乐声：公私企业恢复生产	(102)
2. 刘少奇给资本家吃颗定心丸	(118)
3. 毛泽东：调整工商业	(125)
4. 把艾奇逊的悲叹扔进太平洋：农业恢复	(135)
四、“边抗、边稳、边建”——抗美援朝期间的财经方针	(149)
1. 鱼与熊掌兼得：“三边”方针	(149)
2. 战云飞渡仍从容：家兴业盛	(161)
3. 打“老虎”，去“五毒”：创造干净的经济环境	(174)

第二部 一路凯歌

——“一五”计划时期

五、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提出和确立	(197)
1. 初步酝酿	(197)
2. 深入论证	(199)
3.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	(203)
六、建立工业化初步基础的蓝图——“一五”计划的编制	(206)
1.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206)
2. 周恩来、陈云提前二十二个月开始编制“一五”计划	(212)
3. 中央组织八人小组，毛泽东要求一个月交卷	(216)
4. 七亿两黄金的投资，前所未有的建设规模	(220)
5. 辉煌的成就：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奠定	(223)
6. “156项”的由来：苏联的援助	(232)
七、财经会议平地起风波——高、饶联手发难	(236)
1. 财经会议的起因	(236)
2. 高、饶利用新税制“批薄射刘”	(242)
3. 周恩来请来援兵为薄一波“解围”	(248)
八、一担“炸药”、八种选择——粮食统购统销	(253)
1. 1953年的粮食形势：问题严重，办法不多，难以继	(253)
2. 一担“炸药”、八种选择	(255)
3. 统购统销的初步实施	(264)
4. 上边“三定”，下边“四定”：统购统销的发展和完善	(270)
5. 统购统销的历史作用	(276)

九 “小脚女人”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	(281)
1. 拉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	(281)
2. 冒进与整顿：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	(293)
3.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	(307)
4.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317)
十、举杯同庆的“赎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321)
1. 和平“赎买”和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确立	(321)
2. 公私合营的扩展	(327)
3. 公私合营高潮和“赎买”政策的执行	(337)
4. “赎买”成功的奥秘.....	(345)
5. 个案回顾：公私合营前后的全聚德烤鸭店	(352)
十一、中共召开“八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构想	
.....	(359)
1. 探索体制改革的缘起	(359)
2. 毛泽东率先垂范：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 ...	(364)
3. 陈云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构想	(368)

第三部 欲速不达 ——“大跃进”时期

十二、劲可鼓而不可泄——“大跃进”运动的发起	(385)
1. 急躁冒进的起源：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小冒进	(385)
2. 1956年的反冒进	(389)
3. 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反冒进中揭开“大跃进”的序幕.....	(397)
4. 毛泽东莫斯科之行：“十五年赶超英国”	(400)
5. “大跃进”的发起.....	(406)
十三、最新最美的图画——计划指标的节节拔高	(415)
1.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415)

2. “八大”二次会议：“一天等于二十年”	(422)
3. 体制下放与高指标互相推动	(433)
4. 少一吨也不行：北戴河海滨的军令状	(443)
5. 全民大炼钢铁	(451)
十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461)
1. “高产卫星”上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61)
2. “还是人民公社好”	(470)
十五、欲停不止的“大跃进”——从纠“左”到反右	(482)
1. 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毛泽东从郑州会议开始纠“左”	(482)
2. 工程质量的症结	(492)
3. 钢铁指标的下调	(502)
4. 庐山会议的初衷	(511)
5. 风云突变：“跃进”又起	(522)

第一部 巨人奋起

——经济恢复时期



一、曙光初照——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

1. 勾画蓝图：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制定

(1) 蓝图初构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彩旗飞舞，30万集会群众欢声雷动。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沉睡百年的巨人苏醒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再用一段时间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这幅蓝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就已经预言：“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力量还很弱小，外有强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磨擦”。可

是，在黄土高原上身居土窑洞、吃着小米饭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却高瞻远瞩，满怀胜利的信心，用诗一般的语言，向人民发出了迎接新中国的呼唤。

早在 1922 年召开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我党就制定了自己的奋斗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即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根据这一纲领，毛泽东在 1939 年冬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和 1940 年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指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

毛泽东当时已经指出了新中国即将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发展中，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社会主义因素，即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也在发展，加上国际环境的有利，中国经济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空前发展壮大，终于迎来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的曙光。1947 年 7 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变

化，毛泽东以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看出了这一事态发展的非凡意义。10月8日，他起草的给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显然，这是革命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转折点。

为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开始筹划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10月10日，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双十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提出了“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等八项基本政策。1947年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双十宣言》的基础上，又归结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这一纲领较之于以前的纲领，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这项新内容的提出，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特殊意义的。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在1927年后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利用政治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逐渐积聚形成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它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纲领时，对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在抗日战争中，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提出这一政策的历史条件也不成熟。而在官僚垄断资本已集中了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以后，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已经十分明确。同时，在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已经为大规模内战所取代，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

情况下，提出没收官僚垄断资本的政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这一新内容的意义，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期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由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全国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一旦将其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就能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还对新中国经济的构成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在初步分析经济构成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对新中国经济成分的分析，事关重大，它实际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也是我党制定对各种经济成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具体依据。虽然毛泽东对此已有初步分析，但并未因此妨碍党内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索。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会议（“九月会议”）。这次会议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特别是对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基本经济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发言体现了毛泽东关于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思想。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国营经济、国家资

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四种形态构成；民主革命阶段结束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还说，必须严格地说一句，在中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将来新中国建立后，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作了一个估计。他在插话中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他认为：“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会议认为，提出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研究，对于避免在新形势下、新问题上又糊涂起来，犯“左”或右的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和有益的。对于经济性质的分析，毛泽东很慎重。在会议结论中说，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请刘少奇继续考虑，并草拟文件，以待七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讨论用。

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于9月15日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报告送给中央。东北局于8月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会后，他以第三部分《我们在城市中的阶级路线》为基础，根据大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写成提纲，交东北局讨论通过并报中央。当时，东北解放区内有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城市工作的实际经验比其他解放区要多。这个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报告中的这一论述，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几点：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范围内，不能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除开国家总的计划

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随后，刘少奇对提纲作了精心的修改。

10月26日，毛泽东看过刘少奇的修改稿后，赞扬他修改得很好，并提议由中央批准这个提纲，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对提纲中“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毛泽东提出要改为“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他指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轨道之内。

这样，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这个分析就肯定了下来。毛泽东在1949年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经建方针，9月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今后对经济构成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路线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东北那个文件，基本上对的，与9月讨论的相符。

（2）蓝图细化

这些基本方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更加完备的表述得到通过。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这时，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全国胜利近在眼前。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前夜召开的这次会议，需要解决新中国面临的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全会期间，共举行了八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在3月5日下午开始，由毛泽东作重要报告，讲了10个问题。此后，每天拿出半天来开大会，由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负责人汇报工作，围绕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讨论。13日大会闭幕，由毛泽东作总结发言，简要评价各地工作，对个别问题作补充说明，并系统地讲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他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进入城市，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进入城市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方法。

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于这一点讨论得十分热烈。邓子恢的发言有很大的代表性。他说，今后工作中心转入城市，进城后依靠工人阶级，抓紧恢复与发展生产，毛主席把这两个问题明确肯定地提出来非常必要。进城后依靠谁，思想上模模糊糊。郑州、开封首先抓贫民及苦力工人，忘了产业工人，这是普遍现象，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明确。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生产，这一点我以前就不了解，以为要在发动工人之后，才搞生产；不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你怎样搞工人运动呢？

搞城市工作，要有干部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把军队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党中央当时确定由陈毅负责将来接收上海。陈毅明明白白地说，最头痛的就是接收，二十几个部门要配干练的干部，还要懂高等技术，“希望全党抽调干部帮一把”，“希望中央

如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齐心协力。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除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以外，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当时，中国已经有 10% 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还有 90% 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这个基本国情，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对几种不同性质经济成分的政策。他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

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根据以上政策，在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经济成分的构成情况是：国营经济，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